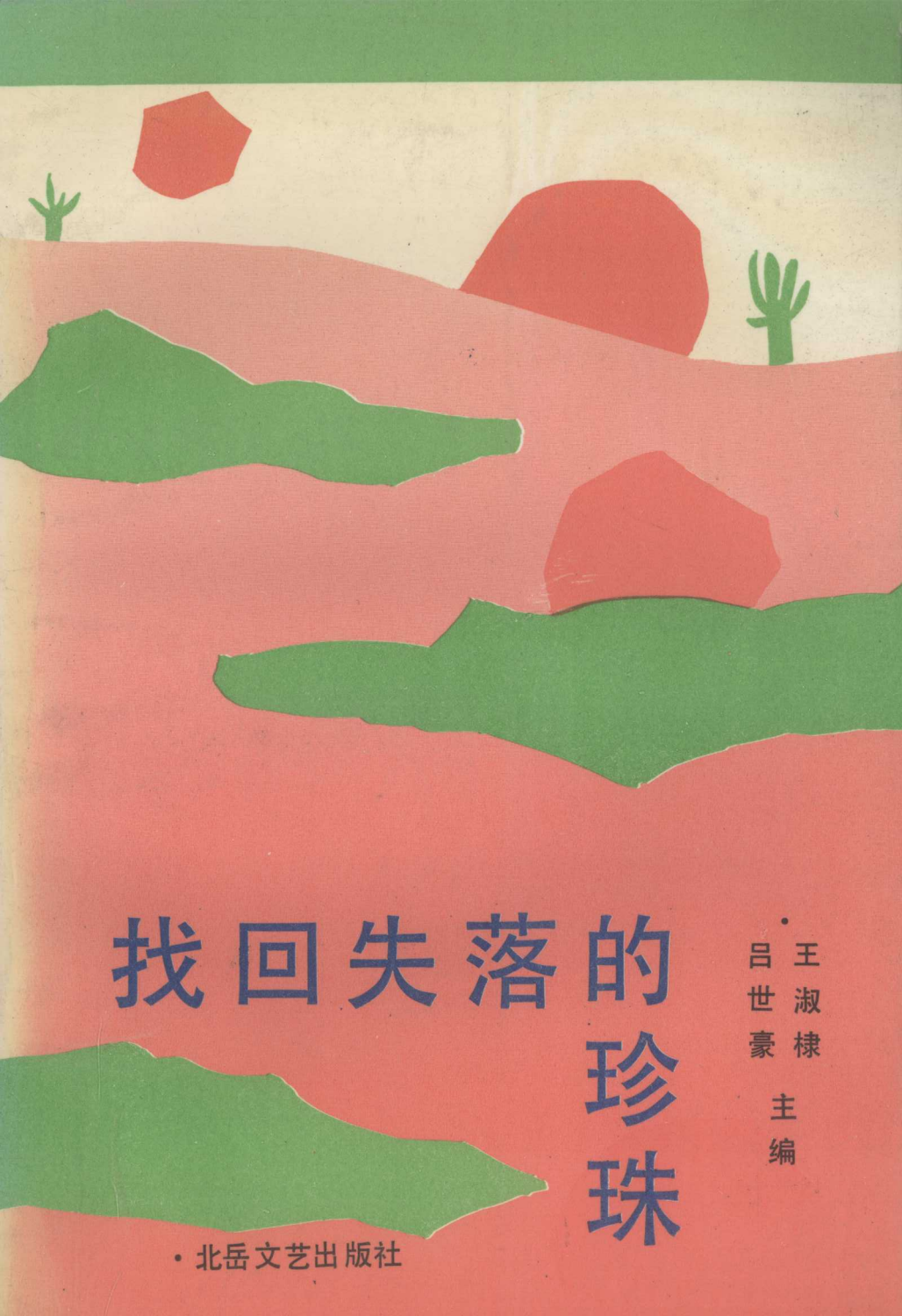




找回失落的珍珠

· 王淑棣
吕世豪 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找回失落的珍珠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82 印张: 9 字数: 200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册

*

ISBN 7-5378-1036-2

I·1014 定价: (平)5.50元
(精)7.50元

序

马烽

早在五、六十年代，汾阳县贾家庄已经是全省农村有名的先进典型了。那时，报纸、电台经常报道贾家庄的信息。到村里来参观、访问、取经送宝的人络绎不绝。当代文豪郭沫若也曾来此视察过，并亲笔题词给予鼓励赞扬。

这本报告文学集，写的是贾家庄今天的现实情况。这些文章全都是由本县业余作者撰写的。他们要我为本书写序。他们所以找我，是因为知道我早年间在这村下过乡。后来也断不了到此参观访问，算是熟地方了。对他们的要求，我不便拒绝，只能答应。这些文章我大体都浏览过一遍，我不能不对这些作者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以饱含热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了贾家庄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幅新的壮丽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些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战线上拼搏的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们是农村建设的支柱，也是率领村民奔向小康的带头人。不仅写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克服各种困难的壮举，也写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写了他们的欢乐，也写了他们的苦恼。透过这些人物特写，似乎可以听到贾家庄奋勇前进的脚步，似乎可以看到未来更加美好的蓝图。读着这些文章，自然而然使我联想起了贾家庄的过去。

有好几篇文章中提到贾家庄过去是一片下湿盐碱滩，村庄破

旧，村民贫困。我知道这不是故意夸张过去的困苦，要和今天现代化的新型农村作对比，以取得反差效果。而是当时确实就是那样。我第一次到贾家庄，是一九五二年春天。我所看到的地里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村里街道上泥泞不堪。去一些人家吃派饭，进门要踩着半头砖上炕，因为春天泛潮，地上都是泥水。当时我所以去贾家庄，是因为听县里同志介绍这村新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我那时在北京工作，下乡来就是想看看农村有什么变化。那时候这个初级社社部扎在村中的龙天庙的破房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入社的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大都是贫下中农。牲畜、犁、耙都是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整天吵吵嚷嚷，一切工作都待起步，又没有经验。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分子外，大部分人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那时候的口号是“入社自愿，出社自由”，他们觉得试上一年不合算还可以退出去单干。老实讲，当时我道理上知道走合作化道路是必然的趋势，但这个社能否巩固住，能否办好？思想上还是打了个问号。

第二次去贾家庄是一九五三年秋天。那次是和我的老战友西戎一块去的。这年夏天他曾在这里蹲过点，对村里的情况比我熟悉。经过近二年的考验，农业社不仅巩固了，而且扩大了，已经发展到七十多户人家，并且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食亩产超过了单干户的水平。人们的精神状态、生产规模也显示出了一点新的气象。秋收以后，报名入社的人更多了，连几户富裕中农也自动报名入了社。以后不久就发展成了高级社。农业社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狠抓了农田基本建设。开挖排涝渠，改土治碱。另外还引进了新式农具。那时的所谓新式农具就是马拉七寸新式步犁和双轮双铧犁。但这已比老牛拉木犁先进的多了。

后来，我差不多每隔一年半载，总要来一趟贾家庄，有时候是看看，有时候是小住些时日。每次来，总会发现村子的一些新变化。畜力耕地变成了拖拉机牵引，用上了播种机，收割机；打场用的石滚、手摇扇车变成了脱粒机、电动扇车、烘干机；旱地里打下了井，由畜力水车变成了锅驼机、电动抽水机；人推驴拉的石磨、石碾变成了电动工具。经过了大约十年时间，贾家庄终于成了汾阳平川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村庄。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引进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合理密植，实行科学种田。因而粮、棉产量逐年上升。除了狠抓农业以外，很早他们就注意到了畜牧业和工副业的发展。贾家庄地处平川，没有大片的草坡放牧，他们就利用秸秆、瘪粮食以及稗子渣办起了猪场、马场——自繁大牲畜，也自用也出卖；还办起了醋坊、酱坊、酒坊以及铁木加工场。现在看来这都是些因陋就简的小作坊，总括起来资产还不如现在贾家庄任何一项工业的零头多。但可以证明他们那时就有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思想。不仅解决了社员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增加了农业社的收入。那时候，无论社员口粮还是劳动工分值，贾家庄是各村最高的。公共积累也是全县之首。

这些事说起来简单，具体干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这条路子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这些成就是一滴心血一滴汗水凝聚成的。贾家庄所以能取得那样的成就，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一批骨干力量。如老社长贾焕星，老支书宋树勋、邢宝山，妇女队长赵玉芳，老会计张玉瑞、武士雄，以及生产队长张克让、任伟文等等，都是农业社的有功之臣。他们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但他们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这一壮丽事业。他们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他们各有各的脾气，

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为人处事的方式。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把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紧紧联在一起。坚信“锅里满了，碗里就不会空，”这句老实话。因而很少发生干部多吃多占行为，更没有贪污盗窃事件。另一个共同点是以身作则，带头实干，凡是脏活累活都是这些人扑在头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调动广大社员积极性的法宝。有时候他们也为一些事情互相争吵，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干部会，也参加过党员会，常常是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有时争得横眉竖眼，面红耳赤，可是一经会议作了决定，大家都是不声不响地去执行。对乡里区里县里的一些指示、号召也是认真贯彻。比如大积农家肥，植树造林，交售爱国粮等等，差不多都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有时候上级难免也下达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指令。这会给他们造成很大苦恼。抗，抗不住；干，干不成，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加以应付。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已经是初夏了，县里硬性规定各村必须培植亩产千斤的高产田。贾家庄报的是谷子亩产千斤。谁都知道谷子是低产作物，不同于高粱、玉茭，亩产千斤太难了。有一天我到了贾家庄，社长贾焕星陪我去看他们的高产田。只见谷苗密密麻麻一大片，象是一块绿色地毯。我说：“苗子太稠了。”老贾说：“人常说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谷子地里卧小鸡，还嫌谷子稀。”我说：“你这谷地连麻雀也卧不下，这能打下一千斤？”老贾狡黠地笑了笑说，“可是绿茵茵齐刷刷的挺好看。”接着他坦率地告诉我说，这是为应付上级检查采取的紧急措施。这片谷地根本就没有薅苗，不要说打一千斤，恐怕连穗穗也结不下。不过就是一粒不收，也影响不了全社的总产量，因为只有这么五亩。好在收些干草还可以喂牲口。我笑着说：“你太狡猾了。”他也笑着说：“你回了县里可别参

我们一本哇！”我知道他们这样弄虚作假是由于瞎指挥逼出来的，因而我一直替他们保守着这个“秘密”。

如今，贾焕星已作古了。其他一些人也因年老体衰退下来了，但我常常怀念他们。有时去汾阳也断不了看望看望这些老伙计。我和这人都很熟悉，和不少老社员也很熟悉。我和他们可以正南把北谈问题，可以坐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天，也可以随心所欲开玩笑。我对贾家庄工作上没有多少帮助，倒是从这里获得了不少创作素材。我写的短篇小说如《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老社员》等就是取材于这里。还有一些作品是从这里得到启示而构思创作的。这也是我乐意为本书写序的原因。

这本报告文学集，不是专门介绍贾家庄的全面情况，也不是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而是一些人物特写。准确地说，是“三中全会”前后新上台的一些干部和骨干分子的人物素描。这些人可以称为贾家庄的第二代主事人。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比老一代文化层次高，思想开阔，接受新鲜事物快，气派大，勇气足。在今天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敢于游泳，敢于冲浪，敢于冒风险，敢于实事求是地取得胜利。他们没有象某些地方新上台干部那样，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否定过去合作化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把过去的干部贬的一无是处。他们恰恰相反，不仅尊重历史，而且十分尊敬老一代干部的功绩，十分珍惜他们用血汗积累起来的那些集体财富。从《胆识》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新任支书邢利民，为什么那样徬徨、苦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忧心忡忡？唯一原因就是不想照有些地方那样三下五除二把集体家当捣砸了。宁可个人受压也不随波逐流。最后终于找到了双层经营的办法。既能发

挥集体的优越条件，又能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最可宝贵的是他们继承了老一辈集体致富的观念。不论办大工业，还是走向市场，都不是为了培养少数几个富翁装门面，而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在大部分人思想还不解放，对改革开放政策有怀疑，不敢大胆致富的时候，干部和党员们带头承包了那些作坊，有的还贷款办起了小型工厂。由于经营有方，事业兴旺发达，利润成倍增长。当人们相信了政策不会变，急于想致富而又找不到门的路时候，他们竟然把这些一本万利的企业交回了集体兴办。并没有人逼着他们走这步棋，而是他们自觉自愿这么做的。他们说：“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算大账划得来。”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啊！

这本书里包括了十二篇文章，写了十二个人，其中有干部，有工人，也有个体户。可以说这是如今贾家庄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就文章本身来说，各有千秋。谈起来都还顺畅。如果以高标准要求的话，就感到叙述、议论稍多了些，而具体描写则有点不足。或者说是文字上加工雕琢多，细节和性格语言少。因而所写的人物就不够活，不十分丰满。这大概是作者和描写的对象不十分熟悉的缘故。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勾勒出了这些不同人物的特色，写出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写出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奋斗的情景。写出了他们的远大抱负：为全村人奔小康而不懈的努力。

东拉西扯说了一些感想，权当作序。

1992年冬末于太原

目 录

序 马 烽 (1)

胆识 王希亮 吕世豪 (1)

铿锵的乐章 沈学文 侯晓冬 (36)

“急猴猴”小传 韩守林 吕世豪 (69)

找回失落的珍珠 吕世豪 王希亮 (89)

女人不是月亮 李原生 韩守林 (114)

带给田野的微笑 侯晓冬 吕世豪 (39)

田野上的旋律 侯启山 (160)

绿碑 田文海 韩守林 (181)

抹去那一片疑云 侯晓东 孟瑞云 (200)

赵满春印象 珍船 启 俭 (217)

武士英速写 高耀明 韩守林 (232)

奉献者的足迹 王希亮 李 宏 (252)

后记 (275)

王希亮 吕世豪

“怎么？”老马惊诧的眼神从镜片上方探出。想想，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再想，前一阵子回汾阳时所见所闻，心里就恍然大悟，知道是说土地下户的事，便慈祥地笑，指了指马扎让来人坐，自己站起来沏茶。

马扎一阵怪响，呲牙裂嘴，终于承受了那重量。

老马沏好茶端过来时，那人已自己动手从茶几上烟盒里抽出一支，咻咻地抽起来，脸依然红，是标准的农村后生的颜色，眼里依然流着急，是憋着冲决堤坝狂洪的急。老马就打趣：“天早不忘锄苗子，雨涝照样浇园子，有什么能急成这样哩。”那人便憨憨地笑了，露出雪白一口瓷牙，“也是，性急吃不了热豆腐。”

“杏绵，”老马给老伴打招呼，“利民来了，你出去买些菜。”

邢利民，山西省汾阳县贾家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三十岁了，在老马眼里还是孩子。

“你父亲身板儿还硬朗？”老马问。一见利民，他就想起邢宝山，就想起贾焕星、宋树勋、武士英……互助组，合作化时，那可是一班红黑不挡的虎将。遇到难题，也找老马。

“硬着咧，”利民说，“一顿一饶碗掐疙瘩不够，到了地里后生们也不是对儿。”

老马便舒心地笑了。

利民说的“四水围村”是指土地下户的事。从1982年开始，一年时间里，汾阳县318个行政村已有312个村把土地全部放下去了。山西省的老先进贾家庄却没有放，邢利民在那里撑着。

利民已平静下来，迫不及待地告老马：“刚开了三千会，茬口是硬了，我看是非放不可了，您说呢？”

“你先说。”老马很有耐心，站起来给这晚辈倒茶。老人身

材矍铄，清奇中又透慈祥，而那灰白了的头发向后拢去，象每一根都充满了智慧。

利民怔怔地看了老马。钢铁般的汉子眼里便湿润，他有一肚子话，但人们都不要听，只是说，上头让放你就放，错了也不是你的事。这就让他不服，当干部的还要不要责任心？

蝉还在振颤着翅膀发出“呜呜”的响声，原来这东西不是靠嘴，而是靠翅膀的运动发音的。杨树枝头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着光。老马说：“你往阴凉里坐坐，别上了火。”然后就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不时，还往本本上记。

这样，他就不仅了解了利民的心思，同时也知道了许多细节，比如谁谁谁是什么态度等等。

这一年，端午节刚过，炎热就光临了。老人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热过。

比气温更热的是兴奋的人心。联产承包已成燎原之势，给步履蹒跚的农村经济注入生气，汾州大地就成了沸腾的海洋，不时溅起波涛浪花。邢利民就觉着自己是贾家庄这艘航船上的舵手。在海洋行驶，舵手就万万不能迷失航向。而现今，许许多多基层干部却是随风倒，这就让利民气恼。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一时还看不清彼岸的灯光，就不敢随波逐流。他要把这艘船稳稳当当地带到彼岸，而不是抱着三根梁子两根椽上岸。

三千会后，邢利民象换了个人。见他干活时虎着脸，谁也不搭理。晚上，坐在床头抽烟，没有一丝疲倦，方脸变成长脸，胡子埋了脸面，急得妻子掉泪。睡梦中，他喊，我不能当败家子！

事实上，利民在寻找一种适合于贾家庄的联产承包的最佳模式，他要使中央精神一丝不苟地落到实处，因此就不能当风派人物。他反复琢磨毛泽东关于反潮流的论述，觉得所谓反潮流，

常常是指能顶住革命大潮中那些逆潮流的势头，那些貌似潮流其实是逆流的货色。况且，他要为贾家庄的父老乡亲负责，他不能当“败家子”。

为此，他承受着多少误解和压力啊。

来自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讲话说，“一些农村干部顶住不放，就是想要为非作歹，喝人民的血，吃人民的肉……”上边吹风了。

公社一位舞笔杆子的在报上甩了块豆腐干，题目是：《上头放，下头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后院起火了。

村里一位善于编排人的“民间艺术家”，也应运而生地编出了顺口流：“中央有个邓小平，折不过贾庄的邢利民……”火上加油了。

这就使邢利民不能接受。非但不能接受，他还真想到北京给中央反映一下。可眼下，他却那里也不能反映，只在心里说，我邢利民如果不拥护、不贯彻党的政策，何以这样认真，这样谨慎！看来，眼下当个凑数干部并不难，唯唯诺诺就是了。可是要当真正合格的好干部，又谈何容易。贾家庄七十万集体财产是合作化三十年来的血汗，他能不慎之又慎吗？

好在公社书记理解他。或者说，他也有同样的困惑。

“你的心思，我清楚。贾庄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三十年了，不容易。特别是老辈人创这点家当不容易。撒撒手，分去了，让我也觉着可惜。可分，这是大势所趋。搞了几十年农业，我觉着中央这一步确实英明。不走这步，这盘棋就会被憋死……关键是怎么个放法……”恺仁书记以他惯有的敏锐分析和逻辑思维表达着他的意思。那时，利民圪蹴在公社书记的窗跟底一言不发，手里掐着扁扁的烟屁股狠抽。英俊壮实如雨后青山，又象一

只囚在笼中的老虎。

“现在的问题是……”公社书记斟酌着语气，掏出一支大前门递过去。他要说服利民，同时也在说服自己。做为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两位书记，他们绝不是怀疑中央政策，不是的。中央的红头文件在他们心里比生命还金贵。他们所忧虑的是，当潮流涌来的时候，一些人盲目地、有的甚至是过分地随波逐流，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思维，那并不是好事。“有的大队瓜分集体财产，三不值二，随意挥霍，牲口分了，牲口棚也要拆了，连风门上的玻璃也要下走，简直是趁火打劫！做为共产党人，如果欣赏这种做法，那就毫无党性可言。这和我们所要求的放完全是两码事。”

邢利民依然蹲在那里，那些话也就是他的话。他三十出头，用时的评价来说，是“敢斗肯受”的典型。三中全会以来，他拼命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到眼前无论是横比还是竖比，都向前窜了一大截。这次关键时刻的犹豫与平时的豪爽大度、排山倒海的气质迥异。恺仁书记善解人意，他从这里看出了一个青年干部的成熟。所以，尽管上头催得紧，他也不愿意简单地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要去探索一些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以使党的富民政策得以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贯彻。

利民的父亲邢宝山当了一辈子干部，现在也只能为儿子着急，贾庄的一草一木，无不浸透着他们那一辈人的血汗。因此，他对于儿子的了解也就透彻得多。只是，一个月了，儿子黑着脸，对谁也没句话，他怕他急出毛病。告诉儿媳要耐心地多规劝他些。清秀温柔象一潭活水的玉娥来自边山河堤村，山里人的厚道和庄户人的心计使他成了贾庄村有名的贤妻良母。她的心理能不急吗？

利民把这件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想了个透，就径直上太原找老马来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老马就和贾家庄人结下不解之缘。在地头、在炕头、在老槐树下、在小水渠边……人们习惯了向他倾吐心里话。老马注意这里的事，熟悉这里的人，清楚贾庄走过的每一步。这次，贾庄人心里有事，这土地该是怎么个下法？这集体经济又该是怎么个搞法？

老马沉思片刻，用那纯而又纯的乡音说：“这下放有两种放法。放好了，是大好事，贾家庄由此而富裕。放不好，顾前不顾后，那就会伤了元气。集体经济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发展。没有了这条，那不成单干户了？”接着，他自然而然引开话题，谈起了家常。“我有个妹妹，在山里，过去穷得出不了门，年年我都要给寄一些钱买口粮。这二年，土地承包了。这可不得了，过年过节，大包小包往太原提，说吃不愁了，穿不愁了，比起大锅饭时，现在是在天上。你说，这样的放，有什么不好？”利民听得直点头。“还是我的一个亲戚，说他们那里土地下户时把几十年攒下的集体财产都踢腾光了。各人顾个人，有的户没有生产资料，庄稼都种不下去。有人便乘机发财……这样的分，难道是中央所要求的吗？”老马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其实都是文件上的意思，深入浅出，合情合理。利民仄起耳朵听着，这不正是自己逐摸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那个意思吗？他笑了，一拍桌子：“这才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老马说到点子上了。

些许微风让人惬意地吹过，蝉声已止。利民抓起放在窗台上的涤确良衬衫转身就走。老马急了：“怎么说走就走？”利民那粗线条的脸上露出生动的笑容：“要办的事办了，我还能坐住？有

时间，你回来看看，贾庄人老想着你哩。”

2

中流砥柱

太汾公路很长，从迎泽桥西扯起，悠悠扬扬扯了二百里才到汾阳。就这也比不上利民的思绪长……

他是七十年代中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的，但他对贾家庄的全部了解却是与生俱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他是在集体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

五十年代，他还小。随了父亲开会，知道了贾庄的过去，全村三千七百亩土地就有两千八百多亩盐碱地，贫苦农民是好地种不上，赖地没收成，改碱没力量，排水没希望。父亲说，“那时春天白生生，秋天水洼洼，下种不捉苗，有苗无收成……”所以，他就把父辈们办社的事看得很重。他还记得小时候父母扛着铁锹、推着小车出去，一整天不露面，晚上回家成了泥人。就是这样，村西的一千多亩下湿地变成了良田，村东的一千多亩老旱地变成了水地……后来，他上学的时候，就觉得那绿汪汪的庄稼地里都浸透着父母的血汗。

六十年代的挖截潜流、平田整地、修渠打井……他就记忆犹新了，那两千亩盐碱地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拼命改出来的。他记起全县第一辆拖拉机开进村时的盛况，远远近近来了黑压压的人群助阵，父亲把他举过头顶，问，“看见了吗？”

到了七十年代，利民已经出脱成了敦厚结实的五尺汉子，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带着一身朝气和信念走进了田间，走进了修渠、凿井、清淤的行列……1975年，贾庄的粮食产量突破300万斤大关，经济收入也跃上了80万元的新台阶。但政治风云如夏

日的天气、变化莫测，到年底却落了个“假学真反”大寨的罪名。那时，他已经成熟了，自信可以从老一辈肩上接过那副沉重的担子了。

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切实感到，贾家庄这才算真正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了352万斤，经济收入达到了102万元。这一年，贾家庄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一丝微风从车窗吹入，他坐在窗口眺望两旁的庄稼，满目浓绿和丰硕总是唤起他竞争的欲望。

他站在机电队院里，尽情地让柴油和机油浓郁的气味清洗和过滤着思绪。钢铁无情人有情，记得1965年老支书扛回那面“全国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的奖旗时，全村人竟高兴得彻夜未眠，为了那铁牛，他星夜跑零件、跑油……在那轰鸣着的响声里看到翻起的沃土，心里就欣慰，那是和老一辈“一百把耢头闹翻身”连在一起的欣慰。于是，他招招手，机电队长擦着油腻腻的双手过来，接过烟，眼光沉沉的。他就说，四千亩地，三百多万斤粮，就靠这机电扛撑着，机电队不能散。队长的眼就闪出光：

“不怕人家说你破坏改革？”利民哈哈笑了，“毳，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只要我是为了咱们村，怕甚哩？再说，中央文件中那一条写着光分不统？”

一行行白杨树在炽烈的阳光下愈显得青翠欲滴，利民想起当初栽树时，林业局的技术员说：“有眼光，这绿色银行也是你贾家庄的一份家当呀！”想着，手就不由得摸索着粗糙的树身，久久地不愿走开。六队队长张福昌大步走来，利民说，你看咱这树，一年能长胳膊粗……福昌搔搔头皮，不知所云。利民就说，这树，不能分，要统起来。福昌笑了：“都分了不干社会主义